

# “传播仪式观”理论研究的四大面向及主要争议

## ——基于国内学者期刊论文的分析

鲍 静

**摘 要:**综观2005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传播仪式观”的基础理论与以“传播仪式观”为方法论的新闻与传播现象分析。这些研究使得学界的理解逐渐准确,视角逐渐扩展,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但是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还存在不少缺憾。文章以求同存异为原则,通过探寻“传播仪式观”基础理论研究的四大面向(理论渊源、概念辨析、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关键争议,直面研究中的现实难题,为仪式观的进一步深入探究提供理论观照和学术参考。

**关键词:**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观;文化研究;仪式传播;媒介仪式

**作者简介:**鲍静,女,讲师,新闻传播学博士生。(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44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7)04-0010-06

仪式是一种人类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传播面广、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从19世纪末到今天,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相关研究从未停止过,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十分重视对于仪式的研究。但是仪式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系统,包含了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它们相互交叉,错综复杂。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詹姆斯·W·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他对于这一理论的主要阐述都收录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和《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sup>[1]</sup>两篇文章当中。他反思了当时美国主流传播学的“传递观”,从“生物学、神学、人类学、文学”<sup>[1](10)</sup>等知识材料中另辟蹊径,提出有必要对于传播进行重新思考,他采用了“仪式”的视角,表达了“传播更多的是一种仪式,而不是传递或运输”的观点。这一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传统的美国传播学研究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占据主流的现实下,开辟了一条相对新鲜的研究路径,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自此之后,以“传播仪式观”为视角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成为新闻传播学界探讨的新兴课题,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从侧面证明了这一领域的独到之处。就国内而言,相关研究肇始于1994年,潘忠党发表《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一文,<sup>[2]</sup>这是国内最早提及“传播仪式观”的论文。遗憾的是,作者的研究重点并不是“传播仪式观”,因此当时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2005年,《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一书在国内出版,成为凯瑞及其“传播仪式观”被系统译介到国内的开端。此后,有关凯瑞仪式观研究的论文和书籍相继发表和出版,“传播仪式观”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笔者以“传播仪式观”和“仪式传播”为主题检索词,对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分别得到相关期刊论文177篇和1665篇。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将研究范围集中在核心期刊上,并以作者学术影响力和来源期刊影响力为依据,获得与凯瑞“传播仪式观”理论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58篇。综观2005年以来的国内学者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研究,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传播仪式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本文确定的58篇样本文献中,37篇以此为主要内容);(2)以“传播仪式观”为方法论的新闻与传播现象分析(在本文确定的58篇样本文献中,21篇以此为主要内容)。通过这些研究,学界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理解逐渐准确深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得以逐渐扩展,

具有了方法论层面的意义。当然研究中也存在不少缺憾，尤其是“传播仪式观”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存在各方观点纷繁芜杂、部分概念混淆不清等情况。为此，本文以求同存异为原则，通过探寻“传播仪式观”基础理论研究的四大面向（理论渊源、概念辨析、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关键争议，直面研究中的现实难题，为仪式观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观照和学术参考。

## 一、理论渊源：韦伯、涂尔干、格尔茨、杜威、英尼斯等

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提醒我们要从起源上去理解事物，这能使我们抓住事物的本质。我们追溯“传播仪式观”的理论渊源，除了凯瑞主动提出的思想源泉，还包括作者并未明言却对其产生影响的思想体系。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一书中，凯瑞明确提出他从何处获得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这当中既包括早期的社会学家“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赫伊津赫”等人的著作，也包括了“当代思想家肯尼斯·伯克、休·邓肯、阿道夫·波特曼、托马斯·库恩以及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的思想。当然，凯瑞认为其最主要的思想还是源自芝加哥学派，包括杜威和他的同事及后人“米德、库利、罗伯特·帕克以及欧文·戈夫曼”等人的传播社会思想。<sup>[1][12]</sup>而国内洪杰文、刘建明、郭建斌、韩瑞霞、胡翼青等学者基本依循凯瑞本人提出的这一理论溯源展开详述。

结合凯瑞自身的说法，洪杰文、刘建明两位学者推断，韦伯的文化观、涂尔干的宗教仪式观、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观、赫伊津赫的中世纪社会生活仪式观、伯克的现实符号建构观、邓肯的符号社会功能观、波特曼动物外观的生物学价值观、库恩的科学符号观、格尔茨的文化观等奠定了仪式观的思想基础。<sup>[3]</sup>郭建斌通过对社会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整理，发现凯瑞划分传播的两种观念（传递观和仪式观）分别基于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这两种思想源流。在比较生产、文本和活生生的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的基础之上，郭建斌提出凯瑞研究的起点是从英国文化研究开始（其被认为是基于生产的研究，以威廉斯和霍尔为代表），落脚点在活生生的文化研究上（这一研究方式在格尔茨的著作中得到充分阐述），这一研究方法打通了英国文化研究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之间的联系。<sup>[4]</sup>洞悉这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凯瑞为何会提出“传播仪式观”的视角。

样本文献中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凯瑞受到格尔茨等人的影响，但是对于影响的具体内容却没有深入探究。凯瑞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文中曾经对于格尔茨的《文化的阐释》进行了评价与解释，回顾了其研究进展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许多学者，如樊水科、胡翼青、吴欣慰等人据此提出了凯瑞的思想受到格尔茨解释人类学思想的启发。樊水科提出，凯瑞的文化观念以及对于文化的历史阐述来源于格尔茨，格尔茨的这些思想则是从韦伯那里继承过来的。<sup>[5]</sup>在凯瑞受到格尔茨影响这一点上，胡翼青、吴欣慰也表示认同，但是，他们通过更深层次的分析指出，格尔茨的社会控制的思想对凯瑞的影响更大。格尔茨人类学中的文化取向并没有得到凯瑞的关注，相反完全被他忽略，格尔茨对于文化社会意义的强调才是凯瑞关注和阐述的对象，<sup>[6]</sup>这样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的开篇就提出，他的思想受约翰·杜威的影响至深，凯瑞关于传播观和仪式观的划分的思想来源就是杜威。<sup>[1][3]</sup>杜威曾经提出的西方人思想中对于传播的不同定义启发了凯瑞，凯瑞也自称自己的传播观受到了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和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当然，胡翼青、吴越两位学者认为，凯瑞过分强调杜威的作用是为了建构美国文化研究的合法性，他们认为凯瑞的仪式观是伯明翰的思想而不是杜威的思想，理由是凯瑞的仪式观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与传播，这种对于文化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强调显然与杜威格格不入，<sup>[7]</sup>这样的观点可谓犀利。

除了杜威，米德、库利、罗伯特·帕克、欧文·戈夫曼等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思想对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亦产生过影响。芝加哥学派强调社会的凝聚和整合功能，强调传播作为符号互动活动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库利的“镜中我”概念、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等都给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带来过灵感。此外，凯瑞十分推崇哈洛德·英尼斯，他对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二分法，基本上复制了英尼斯关于媒介—社会的空间偏向和实践偏向的二分法。

对于学术源流问题,基本可以从凯瑞自身的表述及其思想体系中看出端倪,但是凯瑞并未明示的思想源头有哪些?我们不妨从凯瑞的生平和著述、演讲入手,了解其思想体系,并进一步明确其思想源头。例如,邵培仁、姚锦云从理论建构的视角分析凯瑞建构“仪式观”理论的资源,他们指出凯瑞的理论建构使用了“理论”层次的资源(西方基督教生活中的“仪式”观念)和“理论的理论”层次的资源(荣格的“原型”观念),<sup>[8]</sup>这是一种从思想传统、经验和理论的关系入手分析的视角,它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仪式观是如何从思想转化为理论的,更重要的是给我们进行思想渊源追溯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此外,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胡翼青、吴越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的牵连入手,分析了凯瑞建构“杜威—李普曼”之争的真实目的是证明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合理性,<sup>[7](49)</sup>作者对于历史材料抽丝剥茧,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表象背后的真相。尽管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这种追根究底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于我们追溯理论渊源十分有益。我们应该结合凯瑞所处时代的学术实际,对于凯瑞提出这些思想源头背后的真实原因进行深度挖掘,从而大大拓展“传播仪式观”的理论研究视野。另外,我们还可以尝试将凯瑞与同时代的学者进行横向比较,从而了解其理论来源的不同。例如,韩瑞霞通过追寻格罗斯伯格和凯瑞的不同的学术背景、研究经历、见解观点,分析比较了美国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的两种不同选择,捋清了凯瑞的学术思想渊源。<sup>[9]</sup>当然,思想源头不一定是来自某位特定的学者,可以是一种时代观念、一个学术流派甚至是一种人生经历。我们追溯凯瑞仪式观的思想源流,应该在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去考察,无论是历时性的纵向梳理还是共时性的横向比较,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 二、概念辨析:仪式传播、媒介仪式、传播仪式观

在仪式传播研究领域,有着三个非常相似的术语,即“仪式传播”、“媒介仪式”和“传播仪式观”。表面上看区别不大,但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却大相径庭。逻辑起点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其学术重点和研究方向的巨大分野。凯瑞曾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常常决定了学术研究的终点,选择什么样的传播研究立脚点,事关其后的分析路径是否正确。<sup>[1](10)</sup>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对基础概念进行辨析。

对于如何辨识“传播仪式观”与“仪式传播”两个概念的问题,郭建斌、胡翼青、刘建明、樊水科等学者都对此有过深入探讨。朱杰等学者对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仪式”、“传播”等概念做过探讨,<sup>[10]</sup>当然,更多的学者则是直接将传播仪式观作为方法论,并没有具体从概念辨析入手进行分析,即使涉及到概念部分也大多语焉不详。究竟如何理解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樊水科和刘建明两位学者的商榷论文具有代表性。两位学者都同意我国学术界存在对于“传播仪式观”误读误用的情况,但是两位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对于“仪式”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关系问题上。

樊水科认为,“传播仪式观”是从“仪式”的角度理解传播,而“仪式传播”则是将仪式作为传播的手段理解“仪式”本身的传播,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作者的主要论据在于对国内“仪式传播”研究历史的考察。樊水科通过梳理本土“仪式传播”的研究历程,发现本土的学者在研究“仪式传播”时重点指涉的对象是关于仪式本身的一些传播现象,这类传播现象和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传递观”中的那一类传播现象本质上是相同的。<sup>[5](32)</sup>而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却是一种传播研究的新视角,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传播行为,是为了有别于“传递观”而提出的概念。

刘建明则认为,“仪式”一词在“仪式传播”和“传播仪式观”中的含义是一样的,只不过“仪式传播”的外延包含了“传播仪式观”的外延。作者列举了美国学者罗森布尔在《仪式传播》一书中对于“仪式传播”的解读,罗森布尔认为“仪式传播”既包括了“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又包括了“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刘建明认为,“传播仪式观”与“仪式传播”一样,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大众的、人际的传播方式;包含了生活中、宗教上和文化人类学的仪式概念。此外,他还细致分析了戴杨、卡茨、塞拉、科尔蒂等人的著作,认为应该将“媒介仪式”纳入到“仪式传播”的研究范畴中来。<sup>[11]</sup>

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两大重点研究领域，“媒介仪式”和“媒介事件”长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对其内涵、外延及历史渊源的研究也是不少学者探讨的焦点。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与“传播仪式观”的关系问题，相关论文则较为鲜见。郭建斌和刘建明两位学者的论文较有代表性。郭建斌选择了戴杨和卡茨的《媒介事件》、詹姆斯·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作为主要论据，他明确了“媒介仪式”的概念，认为它属于“新闻事件”的范畴，只是被大众传播媒介“记录”或“包装”后传达着“仪式”或具有“仪式意味”。<sup>[12]</sup>他认为，“媒介仪式”和“传播仪式观”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与其类似的是，刘建明在分析“媒介仪式”的概念时，也细致比较了其“媒介事件”的差异与关联。<sup>[13]</sup>他在援用戴杨与卡茨对“媒介仪式”的解读的同时，又参照了英国传播学者寇德瑞对于“媒介仪式”的表述，并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比较了“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关联与不同。总结其观点，从内涵上来讲，媒介事件属于媒介仪式的典型事例，而从外延上看，媒介事件由媒介仪式构成。

所谓疑义相与析，学者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有助于打开和拓展研究思路。当然，对于基本概念的辨析并非止步于此，概念是一切理论的起点，通过分析“传播仪式观”邻近的其他概念，描绘其形成发展的知识地图，对于我们理解“传播仪式观”的具体指涉意义重大。首先，我们需要清楚“仪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的视角去了解，辨析其与传播学层面的“仪式”的区别和联系。此外，要想进一步深化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理解，辨析其与“媒介仪式”以及“媒介事件”的相互关系，我们还需要广泛参阅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介仪式”、“媒介事件”的研究成果，将其与“传播仪式观”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 三、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反文化研究

面对当时美国传播学领域盛行的拉扎斯菲尔德开创的效果研究传统，凯瑞深表失望。他十分尖锐地批评这种行为主义与功能主义占据主流的范式已经“黔驴技穷”、是“经院式的东西”、“裹足不前”。<sup>[1](40)</sup>另外一方面，凯瑞破旧立新，试图从仪式观的视角重新界定传播，这也带来了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全面改观。

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研究方法问题，韩瑞霞<sup>[9]</sup>、王晶<sup>[14]</sup>、闫伊默<sup>[15]</sup>、米莉<sup>[16]</sup>等学者都基本认同凯瑞采用的是文化研究的方法。当然，有的学者强调阐释，例如米莉等；有的学者强调文化分析、符号批判、社会建构等人文方法，例如闫伊默等。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曾经也提到了传播学研究的三种策略，传播学被分别作为行为科学、正规科学和文化科学来进行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对应为对规律、结构和意义的研究。<sup>[1](31)</sup>凯瑞的仪式观显然偏向第三种。他主张将传播学作为文化科学来研究，阐明其意义。这种文化研究不是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诊断人的意义。不同于行为科学的看重经验以及正规科学的“空中楼阁”，文化研究来自于“经验世界”。有些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凯瑞采用的是阐释的、批判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他们在凯瑞的书中找到佐证——《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总统激励未来的仪式和以电报为个案探讨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例子。此外，关于文化研究中阐释的研究方法，王晶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凯瑞所提及的阐释研究方法，并不等同于格尔茨的“深描”，尽管其受格尔茨的影响颇深，但是却超出了格尔茨的研究视野。此外，王晶还认为，凯瑞引入了伊尼斯的历史性、批判性的研究方法，但是对其中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成分却有所削弱。<sup>[14](32)</sup>

胡翼青详细论述了凯瑞提倡的文化研究方法。他提出，凯瑞从方法论而不是认识论的范畴理解文化研究，因此，凯瑞所采取的文化研究基本就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对立面，这点可以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情景、研究目的中看出端倪。<sup>[7](49)</sup>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胡翼青、吴欣慰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却不赞同凯瑞的思想就是一种远离结构性功能性的研究，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从表面上来看，凯瑞似乎是从人类学中借鉴了仪式的文化内涵，但是仪式最终被凯瑞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手段加以强调。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美国传统实用主义立场的复活，而并非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尽管凯瑞提出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但是事实上他却激活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控制观，目的和结构功能主义一样，是为了维护美国现有的社会秩序，从这个层面来讲，它离文化研究的内涵甚远，是结构功

能主义的一种转型，甚至是反文化研究的。<sup>[6](112)</sup>

凯瑞提出“传播仪式观”受到跨学科领域和不同区域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呈现出了多元复杂的特点。对于凯瑞采用了何种研究方法以及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形式，我们应该放在美国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既不能人云亦云、盲从权威，也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不顾历史真实，更不能走向极端而反对一切意义的建构。学者们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于凯瑞究竟是文化研究还是反文化研究我们还存有不少疑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 四、研究内容：类比、实质

在术语辨析、理论渊源追溯和研究方法确立之外，对于“传播仪式观”本身的理解也是学者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如何解读“传播仪式观”与“传播传递观”的关系以及传播仪式究竟是类比还是实质的问题上。

凯瑞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界定是建立在与“传播传递观”比较的基础之上的。郭建斌根据凯瑞的表述分别从隐喻、角色、意涵、传播成功的标准以及功能五个方面来比较两种传播观的差异和各自特点。<sup>[4](8)</sup>这种比较被后来的学者广泛认同并采用。后来又有学者在此基础上，从描述词语、宗教观、目的、符号功能、研究前提、学术传统、意义、关注重点和研究方法等视角提炼并比较了传递观和仪式观的不同。<sup>[17]</sup>但是，存在争议的是，有的学者将两种传播观点完全对立起来，而有的学者则指出两者并不需要彼此否定。郭建斌认为，从凯瑞后来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凯瑞认为两种传播观不需要彼此否定也不能彼此否定，他们具有的是范式层面的差别。<sup>[4](8)</sup>刘建明、徐开彬认为凯瑞提出“传播仪式观”的主要目的是对传递观的纠偏，凯瑞将传递观视为仪式传播的低级版本或根本就加以否定。<sup>[18]</sup>但是，刘建明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sup>[13](64)</sup>中则认同了郭建斌的观点，认为传递观与仪式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硬币的两面。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凯瑞是认可传递观的存在的，其不认可的是传递观在人们思想中所占据的主导位置。

在对“传播仪式观”的理解上还存在一个较大的争议——传播的仪式究竟是一种类比还是一种实质。郭建斌、刘建明等学者分别以商榷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郭建斌援引人类学家格兰姆斯的观点，指出凯瑞仅仅是把传播类比为仪式，这并不是说传播就是一种仪式。此外，郭建斌还提到一个关键词“隐喻”，他认为“传播仪式观”在人类的传播现象中属于隐喻层面的问题。<sup>[12]</sup>刘建明显然不同意关于“传播仪式观”是“类比”和“隐喻”的说法，他明确提出，在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中，“仪式”不仅是传播的类比，也是传播的实质。他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传播是“类比”和“隐喻”这一说法的由来。从凯瑞对传递观的态度、对于仪式观的界定、思想渊源以及传播与仪式的关联四个方面来论证“传播就是一种仪式”，这两者之间是等同而非类比关系。<sup>[13]</sup>

笔者认为“传播仪式观”的研究内容是其理论的核心，对于我们开展新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层面的意义。我们不但要弄清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区别，更需要从两者的传播过程、影响传播过程的诸多要素等内容入手进行深度剖析。对于“传播仪式观”的理解问题，可以和理论溯源、概念辨析、方法确认放在一起进行考证，通过整合并比较分析各方论点，逐渐深化对于“传播仪式观”的准确理解，从而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传播。

总而言之，对于凯瑞的仪式观，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有人被其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语言所折服，有人却对其实践运用和理论发展持悲观的态度。比如，国外就有学者认为仪式观忽视了权力等主要因素，是极其幼稚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还有学者批评凯瑞的仪式观只是方法论上的文化研究，难以付诸实际研究，而且凯瑞本人在提出这些观点之后也并未以此为方法论进行过任何一项研究。相比较而言，站在其对立面的实证主义尽管饱受诟病，却有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事实上，在国外，凯瑞的仪式观启发了公共新闻的创始人，其对于公共新闻的兴起和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传播的仪式功能和传递功能的区分在新闻业的产出中同样存在。凯瑞是公共新闻运动主要思想家泰德·格拉瑟（Ted Glasser）、克里夫·克里斯坦（Cliff Christians）和约翰·普利（John

Pauly)的论文指导老师,同时他也极力推崇公共新闻最重要的学者杰伊·罗森(Jay Rosen)。凯瑞还经常参与制定公共新闻运动的标准。<sup>[19]</sup>当然,凯瑞仪式观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国外的学者曾经掀起过用仪式观研究指导实践的潮流。而在国内,“传播仪式观”的研究方兴未艾,仪式观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广泛运用于节日文化、新闻实践以及音乐、戏剧、影视、品牌、广告等各个研究领域。比如郭讲用<sup>[20]</sup>、魏响<sup>[21]</sup>、钱广贵<sup>[22]</sup>、任拯廷和余毅<sup>[23]</sup>、张方敏<sup>[24]</sup>、李昌<sup>[25]</sup>等学者的论文均有对传播仪式观的研究或视角切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成果良莠不齐的情况,但是也证明了“传播仪式观”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理论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移植照搬,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思想体系,我们除了需要跨学科阅读大量社会学、人类学中关于仪式分析的相关文献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结合中国的语境和实际情况来展开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美]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3-31.
- [2] 潘忠党. 传播媒介与文化: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三个模式[J]. 现代传播, 1996(05): 12.
- [3] 洪杰文, 刘建明. “传播的仪式观”的思想渊源探析[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4(00): 206.
- [4] 郭建斌. 理解与表达: 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A]. 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I)[C]. 2006(08): 8.
- [5] 樊水科. 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 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J]. 国际新闻界, 2011(11): 32.
- [6] 胡翼青, 吴欣慰. 再论传播的“仪式观”: 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J]. 河南社会科学, 2015(05): 112.
- [7] 胡翼青, 吴越. 凯瑞的“仪式观”: 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06): 49.
- [8] 邵培仁, 姚锦云. 从思想到理论: 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路径[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01): 104.
- [9] 韩瑞霞. 格罗斯伯格和凯瑞的差异——美国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的两种选择[J]. 国际新闻界, 2011(09): 47-52.
- [10] 朱杰. 仪式传播观浅议[J]. 当代传播, 2007(02): 18.
- [11] 刘建明. “传播的仪式观”与“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 与樊水科商榷[J]. 国际新闻界, 2013(04): 168.
- [12] 郭建斌. 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 国际新闻界, 2014(04): 6.
- [13] 刘建明. “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现象研究——与郭建斌教授商榷[J]. 国际新闻界, 2015(11): 64.
- [14] 王晶. 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基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现状的探讨[J]. 当代传播, 2010(03): 32.
- [15] 陈力丹. 传播是信息的传递, 还是一种仪式? ——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J]. 国际新闻界, 2008(08): 47.
- [16] 米莉. 传播仪式观: 一种独特的传播研究方法[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03): 89.
- [17] 天地游心. 传播的仪式观: “媒介中心论”的情结?[EB/OL]. 新浪博客, 2011-7-7.
- [18] 刘建明, 徐开彬. “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4): 80.
- [19] 周鸿雁, 孙健. 隐藏的维度——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J]. 东岳论丛, 2010(12): 149.
- [20] 郭讲用. 传播仪式观中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12): 24-26.
- [21] 魏响. 传播仪式观视域下的中国房地产广告解读[J]. 广告大观(理论版), 2011(04): 92-99.
- [22] 钱广贵, 辜泓. 从传递观到仪式观的品牌传播转型[J]. 当代传播, 2016(03): 91-109.
- [23] 任拯廷, 余毅. 浅谈音乐传播的仪式观[J]. 新闻世界, 2012(08): 212-213.
- [24] 张方敏. 影视传播对现实的建构及其实现场域——以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为研究取向[J]. 当代传播, 2014(02): 29-30.
- [25] 李昌. 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对我国新闻实践的启示[J]. 新闻界, 2012(13): 12-15.